

契機與困境： 讀《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

● 陳淑敏

貝克的《全球化危機》透過宏觀、敏銳的觀察，提出幾個有關方法論的討論架構：全球化、全球性、全球主義；解民族國家化；世界社會理論。三者形成相輔相成卻又相生相剋的關連性。



貝克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

貝克(Ulrich Beck)的《風險社會》(*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①直陳：現代社會科學技術所帶來的進步是為了補救、延緩或彌補其造成的危機。弗斯納(Abraham Flexner)在1930年代也曾有着這樣的說法：「科學帶給人的問題勝過其所創造的。」②宛若一核心意識的指引，貝克看待「全球」當前的發展，就像是在夢裏跳崖，夢裏是甜美、刺激的，但是此舉若為真實世界所經驗，其疼痛實在令人畏懼。本文將就貝克的《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論述其內容與觀點。

一 方法論的思考

貝克的《全球化危機》透過宏觀、敏銳的觀察，提出幾個有關方法論的討論架構：全球化、全球性、全球主義；解民族國家化；世界社會理論。三者形成相輔相成卻又相生相剋的關連性，因為商業上

的全球主義帶動全球化的政治議題；貝克又認為政治議題的前景將逐步邁向「解民族國家化」的趨向，然後，此趨向將迫使人類更深刻地從全球視野來處理整個全球性的困境，如生態、核武、貧富差距等課題；可是，這些難題並非無結構地散漫於全球，相反地，它又是依託於整個全球，而這裏指稱的「整個全球」，用貝克的話說就是「世界社會」。於是，「世界社會」的蓬勃與銳不可擋，正是「解民族國家化」的前奏曲。

貝克此書依此輪廓運轉本無大礙，但是，令人驚訝的地方在於，此書最末兩章：〈歐洲作為對全球化的回應〉及〈任選的沒落：歐洲的巴西化〉，幾乎可說是作為德國執政當局的政經規劃白皮書，例如提出德國為了在全球獲得獨特的地位，應該從事環保產品、風險市場等投資。由此，牽動了幾個問題：第一，既然貝克的價值判斷是認為「全球化」、「世界社會」即將來臨，為何又念茲在茲繫於「德國」的發展？第二：貝克雖然窺見了「世界社會」的萌生，可是卻恐懼於這個「世界社會」危機所能造成的所謂「巴西化」，那麼如何使人相信全球化危機的解決之道，是「沒有民族國家的逃脫之路，只有跨國的逃脫之路」？難道全球化危機的出發點其實是依據歐盟與德國的需要與境況為定奪的標準？

整個方法論上的疑點在於，「從鉅視的全球觀點，論證某一國家生存的危機意識，然後，一面主張國家將消亡，又一面把國家作為關鍵的討論對象，進而企圖論證世界

社會將屆」。換句話說，如果全球化危機的形成、風險與機會的創造都是基於全球化的立場與角度來辯證，則此一方法論上的疑慮將能解除。釐清此核心課題，將有助於吾人深入分析貝克此書意欲呈現的主題之間的關連性。以下筆者分別由經濟：資本主義的創造與毀滅；政治：解民族國家化的發展；社群（community）：跨國組織對形塑世界社會的助益；人性：人存在的前途與焦慮等角度，剖析貝克著作之要旨。

二 經濟：資本主義的猖獗與毀滅

所謂資本主義的「猖獗」或「毀滅」無疑帶有規範價值判斷的意味，不過，這在某種程度上正好表達了貝克的立場。在第一章中，貝克指出「虛擬的納稅人」的根源在於全球化的流動，因此資本（企業）家不斷謀求成本最低化、利潤最大化，而最直接的方式就是將投資地、生產地、行銷處、居住地等加以區隔，基準是：哪裏成本低廉就往哪裏去，結果是「全球化的富人」在各種地域自由來去。然而這種來去並非雜亂無章，仍然以居住的國家為核心。這些企業家往往住在固定國家、享受一切的公共設施，卻企圖牟取自身的利益，是「全球經濟挖空了民族經濟和民族國家的根基」^③。那麼，這些被挖空的經濟效益哪裏去了？貝克並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答案其實就在貝克自己所深深掛念的「無工作的資本主義」，

既然貝克的價值判斷是認為「全球化」、「世界社會」即將來臨，為何又念茲在茲繫於「德國」的發展？貝克雖然窺見了「世界社會」的萌生，可是卻恐懼於這個「世界社會」危機所能造成的所謂「巴西化」，那麼如何使人相信全球化危機的解決之道，是「沒有民族國家的逃脫之路，只有跨國的逃脫之路」？

科技竭盡所能以最精簡、最不佔空間、最不需勞動力的手段，形成所謂「資訊社會」。表面看來這是進步，不過，所有人被截然地分割為兩種：一種跟得上此浪潮，一種是隨時被此浪潮甩掉的工作者。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猖獗之處。

「資本主義將成為並製造失業」④。既然無工作，為甚麼還可以說是創造經濟效益的資本主義呢？這與「科技」的發達密切相關。科技竭盡所能以最精簡、最不佔空間、最不需勞動力的手段，形成所謂「資訊社會」(information society)。表面看來這是進步，不過，整個局面的實質卻是「買空賣空」，因為最昂貴的東西往往是無法看到和具體掌握的，如程式設計、電訊、網路通訊等等。換句話說，創造這一部分成果的人，以「虛擬」的時間、空間大量集中財富，並宣稱對世界、人類有所貢獻而哄抬價格，使得愈看不見的生產其價格愈高，進而愈需要以生產看不見的產品謀取利益。所有人被截然地分割為兩種：一種跟得上此浪潮，一種是隨時被此浪潮甩掉的工作者。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的猖獗之處。

不過，當資本主義者所創造的經濟利益一旦只歸屬於某群能跟得上潮流者，那麼生產與消費將變成「高額度的買空賣空」，「觀念是空的，不再能理解、說明、煽動。籠罩在世界之上的陰霾，其原因或許在發霉的語言上」⑤。然則，空的不只是語言，還包括無形的智慧、價值、判斷的牽制。方興未艾的知性經濟與知性社會將衝擊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因此，當代資本主義也蘊涵着終極危機。這種既非天生自然，亦非人力製造，不是看得到或摸得到的資源，就是知識！知識把人鑲於全球的鋼筋結構中，然後，以知識作為販售的頂級物資。權衡看不見的物資價值的具體方式是將知識轉變成鈔票，資本主義沉淪到

以鈔票「面額」作為創造生產優劣的根據，由此埋下毀滅的因子。屆時，全球將形成幾種主調：一是資本主義者的生活與文化失去生命力，無法再席捲全世界，因為能被席捲的已經殆盡了；而另一種則是「非資本主義」，它的本質是貧窮、萎靡、寂寥或者更多更多；此外，也有可能出現「均貧的共產社會」，它會成為資本主義淪落者的天堂。

三 政治：民族國家的消解

貝克提出，全球化是解民族國家的淵源，意指無世界國家且無世界政府的「世界社會」，一個全球性的、被解組織的資本主義正在蔓延。但是，目前並無霸權力量和國際政權(不論政治的或經濟的)對全球化加以主導，所謂「柏林機場的加利福尼亞的廣播」⑥、社會學成為「全球化社會學」⑦，是迫在眉睫的趨勢。貝克不願看到國家的消解，卻又認為國家將被湮沒，關於這點可從幾點事實說明，如：墨西哥美國人與美國墨西哥人；非洲不是大陸而是一個概念；跨國組織、事件、社群、結構無所不在。

筆者承認，自從現代、後現代社會出現後，跨國組織的確比以往豐富多元，不過，跨國組織可以從根本上替代人類對國家、民族的依賴嗎？在現今「世界社會」的運作過程中，無疑出現了许多主導着全球性課題的跨國組織，宛若意欲將國家的組織消解；但是，為甚麼自第二次大戰後國際間的國家數目大量地增加而非減少？這究竟是因為民

族積極建國成為趨勢？還是對貝克來說，整個「解民族國家化的步驟」是先建立國家，繼而建立跨國組織，最後解消民族國家？但是，這樣無法解釋美、英、德、日等全球化顯著的國家為何要爭取當今國際社會的主導權。依筆者看來，解民族國家化的論述不如以馬克思所謂的「工人無祖國」來詮釋更為確切。因為對很多人來說，由於受客觀環境、生存空間與條件的限制，國家幾乎是一種命運而非選擇。例如，中國大陸十多億人口中，究竟有多少人可以自由地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以作為解民族國家的助力？換成是印度，情況亦相去不遠！

因此，在全球化的氛圍裏，與其說是解民族國家化，不如說是在國家既定的權責之外產生了許多必須經由全球才可解決的事務，於是，必須創造另一種由各國籌組而成的全球性活動的權力機關。職是之故，筆者認為貝克的「解民族國家」很難實現，因為國家與跨國組織間是互相牽制而又彼此修正的。

四 社群：跨國家與世界社會的辯證

在貝克的論述中，跨國的概念影響着社會文化的格調，其中包含個人與集體方面。就個人而言，如墨西哥美國人或美國墨西哥人；就集體而言，跨國概念是以組織面貌呈現的，例如，回饋地方的同鄉組織、綠色和平組織、聯合國組織等等。對貝克來說，這一切發展趨勢

的結果就是「世界社會」的形成，以及「跨國國家」的出現。

全球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化)形塑的社會文化，不斷透過跨國力量，例如世界銀行、種族衝突、貨幣危機、體育競賽、軍備競賽、金融趨勢、環保運動等等，滲透至眾人的生活中。貝克認為，這些無所不在的課題並非「命運」^⑧，因為這一切都是人類決定的後果。對貝克來說，這一切兼具普遍主義和特殊主義、結合和分解、中心化和解中心化、衝突和和解。這些思想非常具有「解構」意味，整體似乎邁入某種不斷交錯與切割的脈絡裏，使人難以窺其全貌與本質，這種時代精神反應到現實生活中，形成多元化的社會，但卻又會隨時陷入貝克所言的碎裂狀況：也就是成為沒有(世界)國家的世界社會、多地方的世界社會、去差異化的世界社會；跨國國家是非民族國家也是非領土國家；不是國際國家也不是超民族國家，而是全球地方國家。之所以如此，原因是：防禦全球化與經由跨國合作和經濟、政治、軍事、法律、文化等面向中的互賴性^⑨。貝克的觀察是，全球化形成之依附、落實和安全保障必須立基於「跨國內政」^⑩的概念，也就是全球的事務轉軌成內政處理的意識，因為「世界社會」的順當運轉仍有賴於「政治」力量。

但是，筆者要重新估量貝克的想法：第一、此統籌之「跨國家」的組織為何？聯合國嗎？美國嗎？還是「二十一世紀是中國人的世紀」的中國？這是個需要深思的議題。如果是由聯合國統籌，那麼便要回到「國際」合作的形式，如果是這樣，

全球主義(全球資本主義化)形塑的社會文化，不斷透過跨國力量滲透至眾人的生活中。貝克認為，這些無所不在的課題並非「命運」，因為這一切都是人類決定的後果。對貝克來說，這種時代精神形成多元化的社會。

我們便得問：「跨國家」與「國際」有何不同呢？第二、從去年科索沃、東帝汶的事件中國際勢力的介入來看，民族國家的興衰雖然受制於聯合國的干涉力量，但卻不能由此認為民族國家意識蕭條。筆者並不贊成貝克所說，「世界社會」藉着跨國家所建構的力量將被替代或解消。筆者認為，民族國家的意識依然存在，而世界社會的運作也能繼續發達，兩者的關連並非相互化約，而是相依相存。

五 人性：人存在的前途與焦慮

在消費社會的時代裏，人的價值是依據其消費能力來衡量，世俗的成就更是以個人創造多少財富定義，這個情勢隨着全球化愈演愈烈，因為，人的選擇多元化，各地方的潮流藉由傳媒不斷湧向全球各處，淹沒了人自身的存在意義^①。有見於此，貝克認為透過教育可以為個體在全球化過程中找到安身立命的軌道。對貝克而言，教育並不是以認知、情意、技能等為目的，而是提高「解決複雜的未來問題的能力」，勞動者必須經過知識增值或重新形塑。如果教育制度更能切合世界的脈動，人或許不必因為面對全球化的變迭而感到無所適從。

除此之外，如同《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作者貝爾 (Daniel Bell) 指出：資本主義在前工業化階段的主要任務是對付自然，在工業化階段便集中精力對付機器。到了後工

業社會，面臨的是人與人、人與自我的問題。資本主義在這方面欠帳過多，急需補救調整，新宗教必須在人際關係和個人重新認識社會才能求得，從而成為維持社會一統的精神支柱^②；後工業化社會的中心是服務——人的服務、職業和技術的服務，它因而是人與人之間競爭的世界。此外，從一個研究室的組織，一直到醫生和病人、教師與學生、政府官員和請願者的關係，他們連結的原則是合作、互惠，而不是協調和層級節制，因此，後工業化社會也是群體 (communal) 社會，其中的社會單位是社群組織而不是個人^③。

與貝爾的觀點相反，貝克認為，科學知識帶來的變遷蘊涵着使人的群體認同消褪，從而加深個人生活的不確定性與無認同感，例如墨西哥的美國人和美國的墨西哥人，他們到底代表誰？而不斷來往於各國大城市或鄉村間的人們，到底屬於何地呢？全球化過程的確具備多元選擇的機會，但是，對生活事宜之選擇，應該多到怎樣的程度才算充足？又如果人們已經具備多元的選擇，那麼會否成為「選擇」這個行為的奴隸？貝克在此書中並未表示意見。筆者認為，上述問題應該從個人與自身、個人與群體的互動關係重新了解：「人之存在」這個現實，必須在全球化的風潮裏找到共同的認同與維護的意志，否則，馬克思所說的「物化」恐怕會再度來襲，只不過此次是世界被全球化構築的蜘蛛網牢牢纏住，而所謂「人類毀滅」說不再是空穴來風。

筆者認為，「人之存在」這個現實，必須在全球化的風潮裏找到共同的認同與維護的意志，否則，馬克思所說的「物化」恐怕會再度來襲，只不過此次是世界被全球化構築的蜘蛛網牢牢纏住，而所謂「人類毀滅」說不再是空穴來風。

六 結論：全球化與本土化

透過方法論、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及人性等面向討論貝克的著作，這樣的歸納與其說是評論不如說是反思。全球社會的來臨已經明顯地呈現在眾人眼前，也正不斷地被吹捧、關心，不過，是否也該從另一方面思考：已被遠拋或遺落在全球化時局之外的人群如何生活？如何存在？如果用「適者生存」或「生命自有其出口」一語帶過，恐非負責之作法，會不會有一天人類的區分指標變成「全球化人類」與「非全球化人類」？這樣還不算最糟，如果兩者形成末路或敵意相向，那才是人類的悲劇。

再者，在貝克的全球化構想中，不斷談到全球地方化，這個論題稍顯太躍進了，因為在全球地方化之間，其實還有更應即刻面對的「本土化」議題。如果本土化沒有成功、沒有成形，那麼全球地方化只是某種矯揉造作、缺乏真正生命力的文化，這將帶來認同與歸屬的混淆；當然，不可諱言，本土化亦非易事，在筆者看來，它應由政府此國家機器來膺任，這也是為何筆者深信民族國家不致於隨着全球化的蓬勃而萎靡，反而可作為全球化歸趨之際，一個平衡各地內部精神與認同的力量。

1930年代，IBM創辦人之一的華生(Thomas Watson)擔任紐約商人協會主席，當時因為經濟大蕭條，美國總統羅斯福厲行新政，並要求大企業配合，不少企業營運因此受到影響，華生入白宮向羅斯福

遊說，請他對企業界高抬貴手，羅斯福卻回答他：「親愛的華生，請你回去告訴你那票商人和銀行家朋友，我才沒空理他們，我現在要拯救這個國家，如果這個國家得救了，他們也會得救。」華生感慨之下，後來說了一句名言：「商人看事情的角度和其他人不同，商人認為對的事情，對國家來說常常是錯的。」對於全球化的時局，我們或許應該採取羅斯福的態度，不要因為既得利益者把整個思潮、行為指向全球化，眾人就劍拔弩張地跟隨，在這樣的風潮裏，反而需要更多人從本土化的立場出發，給全球化一個下台階，也給全體人類多一個下台階。

在貝克的全球化構想中，不斷談到全球地方化，這個論題稍顯太躍進了，因為在全球地方化之間，其實還有更應即刻面對的「本土化」議題。如果本土化沒有成功、沒有成形，那麼全球地方化只是某種矯揉造作、缺乏真正生命力的文化。

註釋

① Ulrich Beck,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trans. Mark Ritter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2).

② Abraham Flexner, *Universities: American, English, Germ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17.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⑪⑫ 貝克(Ulrich Beck)著、孫治本譯：《全球化危機——全球化的形成、風險與機會》(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3；11；12；27；34；64；147；145；61；166。

⑬ 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著，趙一凡等譯：《資本主義的文化矛盾》(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89)，頁16。

陳淑敏 台灣大學三民主義研究所
碩士班研究生